

## 《週日談》之八：語言學孤兒院的掌門

我曾接收過兩個語言學的“孤兒”。先說在台灣那個。我1992-1993年到台灣新竹清華大學語言系，客座講授視覺語言學課程。這個學生，上進心很強。她原是台北一家名大學的學生，因教授外訪，歸期不定，系裡的課又沒安排人接替，不知要停課多久。她風聞我在清華開課，就老遠跑來，旁聽我的，來回要坐三個多鐘頭的公車。聽了我兩三節的課後，她懇請我指導她寫論文。我說，如果清華和她原來那家大學都同意，我才可以接受她的請求。沒多久，她告訴我，在行政上，有關方面都沒問題。事情就這樣定下來。

她的論文題目，須要實地調查的數據，並得用英語書寫。一年期限，委實不多。為了節省時間，跟我協商後，她乾脆搬到新竹來。一個星期七天，每天朝九晚八，到我辦公室查資料，寫論文，這樣她可以隨時隨地跟我討論。我的辦公室很寬敞，多放了兩三張書桌，準備給指導的學生用。中午，她騎摩托車到鄰近市場，買兩盒火鴨飯，喝的是阿里山的茗茶，那就是我們的午餐。那台灣有名的火鴨飯，名不虛傳，百吃不厭！這是應我的要求作的安排：免得她到食堂去排隊，浪費時間。午飯後，我出去散散步，或者到圖書館去溜溜，好讓她有個午睡時間。就是籍著這樣的一個緊湊的工作時間表，在我客座清華那一年間，她把用英語寫的碩士論文殺青了。

離開台灣前，我給她作了些申請獎學金到美國念博士的安排。四年後，她在佐治城大學（Georgetown University）拿到博士學位。現在是台灣成功大學獨當一面的教授。

我回到巴黎時，有一個學生想在我們的東亞語言研究所選修碩士課程。所長剛巧去了香港當客座，代所長是所裡的圖書館負責人，建議暫時由我接替指導。所長還沒回來，她已寫好了古漢字碩士論文了。接著，她覺得那位所長

的專業是現代漢語語法（他的論文《現代漢語方位詞結構》（法文，1980），在我的語匯文叢刊行的 — Paris: Editions Langages Croisés），和她的旨趣無關。那麼跟我學習古漢字，顯得順理成章。她就決意跟我繼續進修博士課程。我也樂見其成，在法國第一次有個博士生，總算不枉十年功夫才拿下的那個國家博士空銜（那時候，有這個學位才能指導博士生）。

瞬間間，又快廿年了。她跟台灣那位師姐一樣，在她的專業裡，也自成一家。年前台灣的師姐到英國開會，途經巴黎，在她家小住幾天，相見甚歡。稍後，師妹到台灣去開會，師姐作東道，報以殷勤的招待。

2006年《中國殷商文化學會商承祚甲骨學研究獎》頒發了十個獎，她是唯一的歐洲獲獎者，其餘為中國大陸（六名）、韓國、日本、台灣學者所囊括。她能名列其中，可說是難能可貴的。

她們兩人的性格很不一樣。台灣的那位，樂天而有韌性，有點粵語說的“天跌下來當被子蓋”。巴黎的那位，勤奮可嘉，可惜自信心不夠強。她們倆的性情的差別，我可以各舉一個具體例子來說明。

她們跟我念學位時的處境，有著一個共同點：我要求她們限期把論文寫好。台灣那學生，是因為我要她在我返巴黎前，提交通過。巴黎那個呢，我堅持她，在她的碩士論文的基礎上，用一年時間把博士論文定稿。當時研究所裡的同事都說，她還年輕呢，才二十七，幹嘛要那麼焦急。我二話不說，一定要她在那年年底完成，以便申請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（CNRS）當個副研究員，我認為，年紀輕，正是她的強項！我的估計沒錯。

對我這個嚴格的要求，她們倆的反應炯然不同。

新竹清華校園，晚上十二點才關大門晚飯後，我常常到電腦室工作，間或也跟學生們聊聊天，一直到深夜。有一個晚上，我發現她不按照我的進度表寫論文，而繼續去找新的數據。我的第一反應：多找數據，是件好事，本應鼓勵，但時間不容許。要知道，她的論文還要譯成英語啊！由她去，一定無法如

期結業！我當著眾人面前，大發她的脾氣，啪一聲把門關上，獨自跑回宿舍去。平常是騎她的摩托車的，這一趟，我不讓她送我！然而稍微平靜點後，覺得剛才確實有點過分，讓她在同學面前丟臉。過意不去，就給她掛個電話，儘管已過了午夜。她接電話，頭一句就說：“老師，你怕我自殺嗎？”弄得我啼笑皆非。

巴黎那位，雖然也能如期交卷，並順利受聘 CNRS，卻因我的壓力，大病一場。兩星期後見面時，竟不敢對我說半句怨言。

總的來說，她們倆的性格，真是天南地北。台灣那個，歲數略長，敢於逆流而上，衝勁十足；巴黎的，年紀稍微輕點，却喜歡順其自然，像跟兔子競走那樣，甘心於一步一步地爬行。各有其值得佩服的地方。

還記得剛從台灣回來時，在巴黎一家文具店檢到了兩張同樣的明信片，畫面是一個垃圾桶，桶蓋半掩，露出一個女孩的臉。我分別寄給了這兩個學生，不知道她們領會我的意思沒有？

她們倆都早已學有所成，在兩地分當教授和研究員多年了。

要是沒有這兩個語言學“孤兒”，我就沒有學生。

然而，我還是衷心地希望，這種不正常的現象，在學術界裡絕跡，再沒有這類的“孤兒”。